

再论台湾地区两党体系的可延续性

林 冈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台湾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0)

摘 要: 2016 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 意味着岛内政党生态已经发生“绿大于蓝”的逆转, 但国民党仍是岛内第二大政治势力, 在台湾中北部地区较有基础。台湾对抗性的社会分歧, 决定了民进党和国民党各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党际竞争中的地位优劣与否对党内派系的整合或分化具有形塑作用, 而党内斗争的激化又会透露党际竞争的生态改变和政党轮替的蛛丝马迹。台湾发生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台湾面临的治理问题, 即在社会期望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如何兼顾经济增长和收入公平, 如何界定和处理两岸关系问题。台湾社会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维倾向, 将轮番牵动中间选民, 包括年轻而尚未确定长期政党认同的选民的投票行为。这将导致政党轮替和政策变更不断发生。

关键词: 政党认同; 社会分歧; 派系治理; 国民党; 民进党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7) 04-0075-08

一、引 言

2016 年 1 月举行的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 改变了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蔡英文的得票数遥遥领先国民党籍候选人, 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所获席次高达 60%。同时, 目前“泛绿”掌握的县市人口数接近全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 “泛蓝”仅拥有台湾 22 个县市中的新北市和 7 个中小县域。民进党是否已经改变代表中南部、中下层和中小企业的政党标签, 向都市型政党演变; 国民党的选举大溃败, 是否意味着这一百年老党将永远失去作为主要政党(“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地位, 沦为台湾政坛的第三政党, 甚至进一步“新党化”或“亲民党化”? 关于这个问题, 岛内外学者的看法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 国民党在经历两次选举挫败后, 已经元气大伤, 难以东山再起。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党轮替是政治常态, 正如民进党在 2008 年选举中惨败仍能起死回生一样, 国民党也有可能再在八年后再起。第三种观点则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

在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中, 有人倾向于将 2016 年选举视为带有关键意味的重组型选举, 将对台湾选民的政党归属和投票行为产生长久影响。也有人表示, 2016 年选举不是一般的政党轮替, 而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17.04.009

作者简介: 林冈,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台湾研究中心(国台办两岸关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基地)主任。

引用格式: 林冈. 再论台湾地区两党体系的可延续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4): 75-82.

是世代交替，主要根据是年轻选民，特别是首投族，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民进党或其政治盟友“时代力量”；岛内民众在身份认同和统“独”议题上的变化趋势，将日益压缩国民党的未来发展空间；国民党不接地气，党内存在深蓝和本土蓝的结构性矛盾，加上老面孔当道，年轻人没有政治发展空间；国民党背负党产这一历史包袱，弃保两难；今后岛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等新兴政治势力的矛盾。例如，日本学者小笠原认为，国民党的政治行情尚未跌到谷底，2018年很可能“六都”全丢^[1]。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2016年选举并不意味着台湾政治场域的持续改变，只是民主制度下两个主要政党之间权力关系的常态变动。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年轻选民的政党认同容易发生变化，正如年轻选民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大多支持陈水扁，而2008年又支持马英九一样，难保民进党能够永远稳住首投族的政党偏好；尽管岛内在认同问题上发生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变化，但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与台湾的对外交往问题，仍是岛内划分“蓝绿”的主要政治分野；“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选票基础存在高度重叠性，难以作为主要反对党制约民进党；民进党内同样存在派系共治的结构性矛盾，曾经出现“四大天王”当道的政治瓶颈，延缓了世代交替的进程。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对2016年选举是否属于重组型选举持保留态度。例如，任雪丽认为，国民党的大溃败是否属于致命伤还有待验证，但该党至今几乎没有作出拨乱反正的努力^[2]。卜睿哲认为，光凭身份认同和政党认同偏好的改变，尚不足以断定2016年选举是“重组型选举”。民进党能否在台湾政坛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取决于蔡英文能否完成其雄心勃勃但又令人望而生畏的政策议程，而且是在面对一个不愿予以配合的中国大陆的情况下^[3]。

本文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台湾两党体系的可延续性^[4]。首先，用不同的测量指标，简要说明岛内政党生态确实已经发生“绿大于蓝”的逆转，但国民党仍是岛内的第二大政治势力，在台湾中北部地区较有基础。其次，从台湾的社会分歧来说明两党政治的现实基础。再次，从蔡英文的治理难题来说明政党轮替的不可避免性。

二、政党光谱的变与不变

201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岛内“蓝绿”基本盘从“蓝大于绿”逆转为“绿大于蓝”。朱立伦和宋楚瑜的合计得票率低于蔡英文的得票率。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者的区域“立委”得票率合计为40.8%，低于民进党、“时代力量”和台联党三者合计的48.4%；如果加上民进党支持的7位无党籍人士的得票数，“泛绿”的合计得票率为51.8%，比“泛蓝”高出11%。此外，“泛蓝”阵营三个政党的政党票合计为37.6%，低于“泛绿”阵营三个政党52.7%的合计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民进党所获地区领导人、区域“立委”和政党不分区选票占合格选民的比例分别为36.71%、28.98%和28.59%；国民党所获选票占合格选民的比例则分别为20.30%、25.27%和17.46%，两党得票率按均值计算是六四开。在地域分布上，蔡英文在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等地获得35%以上合格选民的支持；民进党拥有40%以上支持度的县市仍然是台南市、嘉义县、高雄市和屏东县这四个南部重镇。“北蓝南绿”是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尚需更多次选举结果的验证。

认为台湾已经通过2016年的关键选举、发生政党重组的学者，往往援引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统“独”立场特别是政党偏好上的变化，说明国民党社会基础的松动。确实，台湾民众的政党偏好在近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认同“泛蓝”政党的不再是多数。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的调查数据，

在 2016 年 1 月选举后, 受访者对民进党的认同度首次突破 30%, 但对国民党的认同度仍然遥遥领先于“时代力量”, 如表 1 所示。根据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三年间台湾指标民调公司调查数据的平均值, 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度持续低于民进党, 对“蓝营”的认同度低于“绿营”。与此同时, 大约 40% 的受访者没有政党或“蓝绿”偏好。这部分民众是游离于两党体系中的中间选民, 其投票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阶段性政党轮替的发生。2016 年 10 月后, 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因经费问题未继续这项调查。不过,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近年来的政党偏好度调查, 跟上述结果比较接近。如表 2 所示, 对“泛蓝”三个政党的偏好度均值合计 27% 左右, 与表 1 吻合; 对“泛绿”三个政党的偏好度均值合计接近 33.76%, 比表 1 的 33.1% 略高。不同民调数据, 都反映了近年来台湾民意中“蓝消绿长”的总体趋势。同时, 小党的生存空间并未因其在 2016 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有所斩获而发生明显变化。

表 1 政党认同的变化 (%)^①

调查日期	国民党	亲民党	“泛蓝” ^②	民进党	台联党	“泛绿” ^③	中立	拒答
2013.10	22.3	1.1	5.0	24.4	0.9	4.1	38.4	4.1
2013.12	21.8	0.9	5.1	23.7	0.9	4.9	40.0	2.9
2014.3	22.0	0.7	4.6	27.4	0.7	5.1	37.9	1.7
2014.6	25.0	1.1	5.5	23.5	0.5	4.7	37.6	2.3
2014.9	22.2	0.8	4.8	19.6	0.5	5.3	44.7	2.2
2014.12	21.8	0.9	5.1	23.7	0.9	4.9	40.0	2.9
2015.3	18.9	1.5	5.0	27.6	0.4	7.0	37.5	2.2
2015.6	20.3	1.6	5.7	25.6	0.6	5.2	39.1	2.2
2015.9	19.5	2.6	5.6	26.7	0.5	6.0	36.8	2.5
2015.12	21.9	2.6	4.9	28.7	0.8	5.2	34.1	2.0
2016.3	18.9	2.8	5.0	31.4	5.1	4.0	30.5	2.4
2016.6	17.4	1.7	5.1	31.9	4.2	5.1	33.1	1.8
2016.9	18.2	1.6	5.5	28.7	4.4	4.5	35.2	1.9
均值	20.8	1.5	5.1	26.4	1.6	5.1	37.3	2.4
合并		27.4			33.1		37.3	2.4

表 2 政党偏好度的变化 (%)^④

调查日期	国民党	亲民党	新党	民进党	台联	“时代力量”	中立
2013.12	26.7	3.1	0.9	25.7	1.8	/	41.8
2014.12	22.9	2.7	0.8	26.7	1.9	/	45.0
2015.12	22.1	3.7	0.6	31.2	1.2	/	41.2
2016.12	20.8	2.3	0.4	29.9	0.2	4.1	42.3
均值	23.12	2.95	0.68	28.38	1.28	4.1	42.58
合并		26.75			33.76		42.58

英国学者罗达菲从政党体系的碎片化、对新政党的开放性、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党际关系

^①资料来源: 台湾指标民调网站 (<http://www.tisr.com.tw>)。

^②指没有特殊政党偏好但有“蓝绿”偏好的选民。

^③指没有特殊政党偏好但有“蓝绿”偏好的选民。该项民调从 2016 年 3 月起增列对“时代力量”的认同度。限于篇幅, 以下将对“时代力量”和台联党的认同度合并计算。

^④资料来源: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 (<http://esc.nccu.edu.tw/main.php>)。

的性质（合作还是对抗）等四方面探讨了台湾政党体系的演变^[5]。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台湾并没有因为在2016年选举中有18个政党参与竞争34个不分区“立委”席次而导致政党体系的碎片化。在113个“立委”席次中，民进党和国民党占据了103个席次。同时，因为5%政党票门槛的制度设计，新的政党不容易获得席次。虽然民进党取得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过半选票和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的过半席次，宣称要维持两岸关系现状，但仍维持“台独党纲”，与国民党的两岸关系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民进党在选后推动的“转型正义”，不仅缺乏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根源，而且带有强烈的清算国民党党产意味。总之，不管是2016年的选举结果，还是不同民调机构呈现的数字，都意味着台湾“蓝绿”政党分野的延续，改变的只是政党光谱中“蓝绿”所占比例而已。国民党仍是台湾两大政党之一，亲民党、新党、台联党和“时代力量”只是作为两大政党的侧翼存在，并无法取代它们。台湾对抗型两党体系源于1986年的政治改革，具有深刻的制度和社会根源。

三、台湾地区对抗型两党政治的社会基础

台湾对抗型两党政治是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分歧共同形塑的。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采取单一席位选区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两票制和相对多数当选制。这一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党体系的形成和延续^[6]，甚至有助于政党趋同^[7]。支撑两党体系的社会根源是重叠性的分歧，这一社会特征容易导致趋异的政党体系。

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的主要分歧由省籍冲突及对政改的不同态度，转为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对立和经济社会政策上的左右分野。统“独”议题与左右问题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国家认同是最具分歧的议题^[8]，关键区别是推动渐进或激进“台独”、排除统一选项，还是维持现状并保留未来统一选项。岛内政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众自我认同和统“独”立场的左右，导致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分歧。国民党和民进党不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而且在经济发展、社会分配和环境保护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国民党的支持者更关心经济增长和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在意分配正义，担心过于密切的两岸关系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威胁到台湾的利益。在台湾政治术语中，所谓的“蓝天绿地”，形象地呈现了两党的政策差异。第一，中国国民党顾名思义就含有统一的意思，在历史上也确实主张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虽然国民党在过去二十多年，逐渐从统一的立场上回撤并主张维持现状，但是它仍反对台湾“独立”并保留未来统一的选项。与此相反，民进党在国民党通过“国家统一纲领”的1991年，通过了含有“台独”条款的党纲。第二，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具有精英主义取向，与“蓝天”高度吻合。国民党强调经济增长、渐进改革和社会稳定，将大企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视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民党在地域发展和社会分配方面对中南部、中下层和中小企业的利益照顾有所不周，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对军公教阶层则予以更多关照。与此相反，民进党具有浓郁的草根性，与其党旗的底色碰巧吻合。作为长期的反对党，民进党的“执政”经验有限，跟台湾的中小企业、中下层和中南部有更多连接。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停滞造成年轻人就业难、薪资低，为民进党提供了新的支持基础，这或许是民进党可以在大部分城市获胜的原因之一。民进党的中间偏左政策倾向，在蔡英文当局处理台湾中华航空罢工、劳工节假日、增加房屋税和遗产税，以及年金改革问题上均有所体现。其优先考虑的政策主张是社会正义、充分就业和全面“宪改”。如果国民党可以被称为中间偏右的政党，民进党则属于中间偏左的政党，更在意分配正义和劳工阶层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

比国民党更具有自由主义的味道。事实上，在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方面，民进党持保守立场，唯恐两岸经济互赖的加深，导致台湾经济和政治“自主性”的丧失。

“蓝绿”对立的社会分歧导致台湾政党政治的运作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特点。这也决定了与民进党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时代力量”无法取代国民党这一代表“泛蓝”的主要政党。在对抗性的两党政治环境中，媒体介入党争，色彩鲜明且欠缺自由公正的中立精神；立法机构内政党恶斗，多数决原则无法畅通，徒为体现“人治”色彩的党团闭门协商制度留下空间；行政当局的政策容易遭到反对党阻挠，难以贯彻。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台湾缺乏利益交叉的多元社会氛围，在众多政策议题上无法形成由不同少数团体临时构成、不断改变成分的多数同盟。在利益多元社会，理论上不存在永远的少数派，大家接受多数统治原则，不至于出现“赢者通吃”、多数“霸凌”少数的政治丛林现象。但是台湾由累积性社会分歧派生出来的政党政治，加上“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设计，难免造成政党轮替后一方利益的满足以剥夺另一方利益为前提。选举竞争的零和游戏一旦衍生到公共政策层面，就是政党对立和社会撕裂。这就使台湾政党政治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新上台的政党往往总以“全民政府”和中间路线为标榜，结果很快被“打回原形”。另外一种现象是台湾选民往往对新上台的领导人寄予很高的期望，民意满意度甚至高于选举期间的政治支持度，但这种高满意度恰恰意味着选民对政治人物的高期待一旦满足不了，就会导致民意急剧下降。不管是高票当选的马英九、柯文哲，还是蔡英文，都逃脱不了这一怪圈。

四、党内派系矛盾与政党轮替

鉴于台湾“绿大于蓝”的政治现实，两党体系能否维系取决于国民党能否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存在，以谋求东山再起。2014年到2016年的选举挫败，凸显了国民党内“深蓝”和“本土蓝”的结构性矛盾和接班布局的紊乱不堪。洪秀柱从“抛砖引玉”到“抛砖成玉”，国民党从“挺柱”到“换柱”，朱立伦从“临危受命”到“不孚众望”，既跟国民党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也跟民进党见缝插针，怂恿次要对手、挑战主要对手，坐收渔利的策略有内在关系。作为刚当选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等待党内征召的腹案本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却因洪秀柱成功突破“防砖民调”而“破功”。当时，国民党党部委托具有一定“偏绿”色彩的趋势民调公司进行这项调查，而不是找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民调公司，主要原因就是让洪秀柱阵营没有意见。由于这次民调的技术性操作和一些民进党支持者的有意灌水，洪秀柱的民意支持度高达45%以上，与事实明显脱节。结果亲民党的宋楚瑜尾随洪秀柱决定参选，其民意支持度呈现领先洪秀柱的势头，国民党为“堵宋”和安抚中南部“立委”参选人而被迫“换柱”，导致不少深蓝支持者“含泪不投票”。在2012年投给马英九的689万选票中，减去自然凋零（约30万）、转投宋楚瑜（约120万）、转投蔡英文（约40万）、不投票（约120万），也就差不多是朱立伦所得的选票（381万）。如果在2020年选举中，国民党可以避免与亲民党“同室操戈”，鼓励更多的“泛蓝”或“非绿”选民出来投票，将大幅拉近与民进党的票数差距。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需要一位能同时为“本土蓝”和“深蓝”接受的领导人。“深蓝”的洪秀柱难以成为引领国民党再起的关键人物。长期担任马英九副手的吴敦义具有完整的从政经历，得到大部分“本土蓝”和部分“深蓝”成员的支持，已经在2017年当选国民党新任党主席。

在2017年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国民党内参选踊跃，出现了6个候选人，包括吴敦义、洪秀柱、郝龙斌、詹启贤、韩国瑜和潘维刚。其中郝龙斌和詹启贤在洪秀柱2016年初担任党主席后，担

任国民党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胡志强在这次选举中公开支持郝龙斌，反映了洪秀柱领导能力的不足。在国民党党员对6位参选者的721 582份联署书中，吴敦义占221 891份，洪秀柱占128 888份，郝龙斌占108 233份，詹启贤占104 359份，潘维刚占100 870份，韩国瑜占57 341份，都达到了联署要求。由于许多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重复联署不同的候选人或不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也参加了联署，党员联署书总数超过了478 000有效党员数目^[9]。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吴敦义占明显优势。为此，在围绕党主席选举的辩论会和竞选过程中，洪秀柱、郝龙斌和詹启贤均将吴敦义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与前两次较有竞争性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对比，马英九在2005年与王金平的竞争中，以72.36%的得票率获胜；洪秀柱在2016年党主席补选中，以56.16%的得票率当选。在国民党气势不好的情况下，党主席选举出现多人激烈竞争的局面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说明国民党有可为之处，意味着国民党内选举竞争的常态化，但主要竞争者年龄偏大是明显的缺憾。从主要候选人对两岸关系的政策立场来看，“九二共识”仍然是最大公约数，分歧在于“一中各表”和“一中共表”。虽然洪秀柱主张“求一中架构之同，存一中意涵之异”，与大陆方面的立场较为接近，但面对台湾的政治现实，国民党的内部团结比意识形态的纯洁更重要。在两者不能兼顾的前提下，国民党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首先是避免国民党的分裂或新党化。

党际关系的状态对党内派系的分合具有一定形塑作用。在台湾发生政党轮替前，国民党作为长期的“执政党”，其领袖凭借行政资源，压抑党内权力竞争，在“主流”“非主流”之争的背后，是权力定于一尊的基本假设，隐性和非制度化的派系斗争往往导致政党分裂，例如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人士的先后出走。国民党成为反对党后，党内竞争逐渐成为常态。例如，2005年马英九、王金平的党主席之争并未导致政党分裂。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以党辅政”，党内“深蓝”和“本土蓝”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在马英九第二任期，马、王之争再次浮上台面。随着国民党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选举中的溃败，党内固有矛盾再次凸显，不同派系的利益和政策贯穿于“挺柱”“换柱”和两次党主席选举的全过程。基于国民党因党内斗争导致分裂的既往历史，不少人难免担心国民党的再次分裂。但就目前情况看，这一最坏的结果基本可以排除。2016年国民党在洪秀柱的领导下偏向“深蓝”路线，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当一个政党处于败选后的颓势，缺乏可以分配的足够资源，只能依靠基本支持者来加强政党凝聚力。这跟民进党在2008年大败之后走街头路线，出现所谓“暴力小英”乱象有几分相似。但随着选举政治空窗期的逝去，党内公职人员势必要求回归中间路线，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洪秀柱和吴敦义的不同政策取向，不仅仅是个人因素使然，而且折射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

民进党一向有“派系共治”的政治传统，在2000年“执政”前，党内一直存在明显的政策分歧。陈水扁上台后，党内的政策分歧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06年党内派系在名义上解散，党内派系运作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组织强度均有所下降^[10]。但随着陈水扁任期即将届满和扁家弊案的爆发，党内派系龙头围绕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候选人问题，爆发了“新系”和“非新系”的激烈斗争。蔡英文在2008年当选民进党主席后，延续党内“派系共治”的传统；在选情看好的2015年，提出“英派点亮台湾”政治口号，试图缓解党内派系斗争和分赃。例如蔡英文当选后，安排亲信林全出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新系”林锡耀出任林全的副手；非民进党籍的林碧炤、刘建忻出任有关机构的要职；由与“独派”和“苏系”保持较好关系的吴钊燮出任台湾安全事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新系”的陈俊麟和陈文政也在其中担任要职。防务部门、外事部门和陆委会的负责人，以及“驻

美代表”仍由非民进党籍人士担任。但是“亚东关系协会”（现已更名）会长和“驻日代表”分别由“新系”和“谢系”大佬邱义仁和谢长廷出任，加上负责处理涉外交往事务的两岸远景基金会董事长、执行长、副执行长分别由陈唐山、赖怡忠和林廷辉等亲日或知日派担任，反映了蔡英文对“台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此外，由田弘茂担任海基会董事长，由许信良、陈忠信、林文程等通晓两岸事务的人士担任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执行长，由张显超和唐开太担任副执行长，刻意透露出蔡希望继续与大陆交流的姿态。上述人事安排，有些具有过渡性质，有些属于长远布局。在蔡英文享有较高民意支持度时，党内派系之间基本上可以相安无事。一旦遇到治理危机，民进党内的固有矛盾就会爆发，作为反对党的国民党就会趁势而起。从1999年连宋分裂到2005年—2006年民进党内斗和2013年的“马王之争”，都可以看到因党内派系斗争的爆发而导致党际竞争生态改变、政党轮替的蛛丝马迹。未来，这一规律仍将得到进一步呈现。

五、治理难题与政党轮替

蔡英文上台至今可谓风波不断。从在进口美国猪肉问题上考虑放低食品安全门槛，到在冲之鸟岛礁性质上的无原则退让；从在台湾中华航空罢工问题上一味照顾劳方的利益，到对雄风导弹误射事件和大陆游客葬身台湾旅游巴士的善后事宜的不当处理，均反映出蔡英文当局的政策失误。就连“亲绿”的《自由时报》都承认，蔡英文当局在满足原住民、劳工权益的同时，应该致力于提振产业经济、改善民生，从而产生支持公平正义的溢出效果。该报认为，三个月来蔡英文当局在推动转型正义方面积极有为，维持现状则受制于两岸惯性思考，但最需务实推动的五大创新产业，未见当局“努力堆柴火”，“劳工休假治丝益棼，徒令企业经营绑手绑脚”。如果“台湾无法走出八年来的闷经济，就业所得未见有感改善”，蔡英文当局将“留下另一个残垒局面”^①。同样“亲绿”的《苹果日报》认为，蔡英文当局应优先做出政绩，得到民众的信赖，获得更多的正当性，再来处理转型正义等意识形态问题^②。上述两种声音反映出民进党内部对蔡英文治理绩效的共同期望，不同的只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轻重缓急。美国学者指出，蔡英文当局在经济上面对的是根深蒂固、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对其有过高的期望^[11]。事实上，离开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大陆因素的帮助，台湾经济将每况愈下。蔡英文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想靠“新南向政策”寻求新的奥援，是行不通的。

在林全行政团队的民调满意度急速下降后，蔡英文的满意度已开始下跌。随着民意的改变，民进党内的激进派试图通过推动“转型正义条例”和“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进一步清算国民党，转移社会视线，要求蔡英文更换林全行政团队，让民进党籍人士全面掌控行政、安全、防务和涉外系统，回归民进党基本立场及其政策运作。与蔡英文渐行渐远的李登辉也不甘寂寞，试图扶植“时代力量”，形成牵制民进党的政治杠杠。如此，势必加剧台湾社会的“蓝绿”冲突及其势力的新的消长变化。国民党作为“蓝营”主要代表的反对党角色，是“时代力量”等新政党无法取代的。民进党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将加剧蔡英文当局的治理困境，进一步释放风水轮流转的政治信号。

六、结语

台湾2016年选举结果显著改变了岛内的政党生态，已从“蓝大于绿”演变为“绿大于蓝”。与

^①参见台湾《自由时报》2016年8月19日的报道。

^②参见台湾《苹果日报》2016年7月19日的报道。

陈水扁在2004年以些微票数获得连任不同的是，蔡英文的得票数不但大大领先“泛蓝”阵营的两组候选人，而且民进党还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取得了绝对优势。为此，难免有人怀疑国民党作为重要政党继续存活的可能性。但根据本文对台湾选票结构和政党认同的分析，国民党仍属台湾的第二大政党。国民党内出现“一中共表”（以洪秀柱为代表）和“一中各表”（以吴敦义、郝龙斌为代表）的争论，说明“一中”仍是其内部不同派系的共同点，可以通过政策反省，重整内部凝聚力。台湾存在的对抗性的社会分歧，决定了民进党和国民党各有存在的客观原因，短期无法改变。发生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台湾面临的治理问题，即在社会期望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如何兼顾经济增长和收入公平分配，如何处理两岸关系。由于马英九政绩不佳，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支持者不是转移选票，就是放弃投票。如果民进党当局未来不能妥善处理上述治理难题，将面临同样的困局，蔡英文将面临党内外不同政治力量的挑战。党内权力斗争的爆发势必将改变党际竞争的既有格局。换言之，台湾的政党政治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解组和21世纪初的重组之后，两党体系已经伴随2008年的选举制度改革而进一步成型，并将通过定期的政党轮替，达成动态性的权力平衡。这既是选举制度诱导的结果，也与台湾社会的“重叠性分歧”高度关联。

台湾发生政党认同变迁和选票转移的深层原因是社会面临的治理问题。台湾经济发展停滞凸显了贫富差距问题，造成了“父子骑驴”的悖论。台湾想通过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难免会使一些不想跟大陆在经济和政治上走得太近的团体和民众产生疑虑；但若想摆脱对大陆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寻求南向新市场，注定难以成功。最近大陆赴台游客大量减少，对台湾经济和社会已经造成心理层面的冲击。“陆资”“陆客”“陆生”大量来台，可能改变台湾社会现有的生活秩序，引起一些民众不适，但如果大陆人士都不来台湾，会带来另一类的问题。台湾社会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维倾向，将轮番牵动中间选民，包括年轻且尚未确定长期政党认同选民的投票行为，这将导致政党轮替和政策变更不断发生。换言之，虽然台湾发生了“绿大于蓝”的政治变化，但中间选民仍是影响未来选举结果的关键变量。

参考文献：

- [1] 小笠原欣幸. 2016年台湾大选分析[J]. 台湾研究, 2016(3): 1-20.
- [2] Shelley Rigger. Post-Election Party Politics [J]. eds., Jacques deLisle and June Dreyer, Orbis, Vol. 60, No. 4 (Fall 2016).
- [3] Richard Bush. Prospects for Taiwan's Democracy [J]. eds., Jacques deLisle and June Dreyer, Orbis, Vol. 60, No. 4 (Fall 2016).
- [4] 林冈. 再论台湾政党政治的演变[J]. 台海研究, 2016(2): 45-61.
- [5] Dafydd Fel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iwa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86-100.
- [6]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1959): 217.
- [7]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Electoral Laws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8] John Hsieh & Emerson Niou.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J].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2 (1996): 219-235.
- [9] 国民党主席选举联署书总数爆表, 可信度遭质疑 [EB/OL]. (2017-04-19) [2017-06-01]. <http://taiwan.huanqiu.com/roll/2017-04/10501278.html>.
- [10] 林冈.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以社会分歧与选举制度为分析视角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80.
- [11] Pochib Chen. Lessons from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J]. eds., Jacques deLisle and June Dreyer, Orbis, Vol. 60, No.4 (Fall 2016).

责任编辑: 孙德魁